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0

刍议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潘沿¹

(¹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 19 世纪末中国在外压力与内部动荡背景下, 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理论构建以及相应的教育实践, 探讨其文化守成与近代化诉求之间的内在张力。张之洞通过《劝学篇》构建的“中体西用”框架, 以维护儒家伦理为核心目标, 将西学拆解为“西艺”“西政”“西史”三个层面, 试图在有限吸收西方技术、制度与知识体系的同时, 巩固封建统治秩序。这一思想在湖北自强学堂、存古学堂及《癸卯学制》等教育实践中, 表现为“中西拼盘”模式。张之洞的渐进式教育改革虽未能挽救封建制度, 却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提供了历史经验: 其一, 文化自信需以主体性建构为前提, 通过“守约”策略提炼传统精髓; 其二,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协同逻辑超越“体用二元”, 启示当代教育应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共生; 其三, 教育改革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缓冲带, 通过局部试验、师资转型与评价多元化实现动态平衡。

关键词: 张之洞;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教育思想; 现代启示

一、引言

在 19 世纪末的中国,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动荡, 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愈发突出。鸦片战争的惨败揭露了清朝的腐败与无能, 西方列强的侵略使得中华文化及传统思想受到了严峻考验。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一种探索自我救赎与复兴的思想应运而生, 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成为了当时知识分子及政治家的重要思潮。这一思想的核心在于, 既要守护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又要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与 modern 管理理念。张之洞认为, 中国的复兴并非要完全抛弃传统, 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他的这一观点, 不仅对当时的洋务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也为后来的文化复兴与现代化进程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解析这一思想的形成与实质,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的文化战略与发展方向。

二、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后, 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与经济渗透彻底瓦解了传统中国的“天朝”秩序。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清政府的军事与技术落后, 而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则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社会根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目标, 试图通过引进西方军事工业与民用技术实现国家振兴。^[1]然而, 甲午战争(1894-1895)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器物革新”的失败, 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维新派与革命思潮随之兴起, 主张从政治制度层面效仿西方此时的张之洞进入宦海不久, 在目睹国破民艰的情形下, 深感我国已陷入“尽撤藩篱, 喧宾夺主, 西洋各国援例均沾。外洋之工作巧于华人, 外洋之商本厚于华人, 生计夺尽, 民何以生”^[2]的困境。

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传统儒家文化与西方现代价值形成尖锐对立。顽固派坚守“夷夏之防”，视西学为“奇技淫巧”；维新派则主张以君主立宪取代封建专制。张之洞敏锐意识到，单纯排斥西学将导致亡国灭种，而全盘否定中学则会丧失文化主体性。^[3]他在《劝学篇》中批判“守旧者不知通”与“开新者不知本”，强调“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试图通过划分“治身心”与“应世事”的界限，为西学传播提供合法性，同时巩固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这种思想调和既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对西方挑战的被动回应，也揭示了封建统治集团在现代化压力下的自救逻辑。

传统科举制度与书院教育在晚清已无法满足社会需求。洋务派虽创办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但“中体”与“西用”的割裂导致人才培养效率低下。甲午战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刺激了中国知识界，张之洞意识到教育改革需兼顾中西：一方面简化经学教育以“守约”，另一方面引入西方分科体系与师范教育。1903年由其主导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首次将“经学科”独立设置，同时纳入西学课程，标志着“中体西用”从理论向制度化实践的跨越。这一变革虽未突破封建纲常，却为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不是简单的文化折中，而是在新旧冲突中构造的“文化防御体系”，其核心是通过“体用”划分维护封建伦理的绝对权威，同时有限度地引入西学以应对危机。这一思想在《劝学篇》中被系统表述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矛盾性。

（一）“中学”的核心：儒家伦理与经世传统

“中学”也称旧学、内学。张之洞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治、地图为旧学”。^[4]“四书”、“五经”是“中学”的核心。“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人因时，言非一端，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5]“中学”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张之洞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他将纲常伦理视为维系社会稳定的“治心之术”，认为若无此根基，“虽举泰西之文明而悉输入之，适足以为大乱之阶”。例如，湖北自强学堂课程虽引入西学，但仍规定学生必须每日诵读《孝经》《礼记》，以强化伦理教化。

经世致用是儒学的工具化转向。张之洞对传统经学进行实用性改造。《周易》所言“显诸仁，藏诸用”的化育理想，在张之洞手中异化为“守约”原则：他要求士人“学贵通今致用”，将《大学》的修身齐家降格为技术官僚的培养手册。这种矛盾在湖北农务学堂的实践中尤为显著：虽开辟试验田种植美棉，却禁止使用化学肥料，因其“破坏土地伦理”，暴露了“中体”对“西用”的根本性制约。张之洞主持编纂《书目答问》，剔除“空谈心性”的理学内容，强调“通经须明大义，归于致用”。在《奏定学堂章程》中，要求简化经学教学，将《春秋》重点放在“经世大义”而非考据训诂，甚至提出“删减《周礼》繁文，但讲田赋、军制、官职诸实用篇目”。这一转向使儒学从道德哲学转变为服务洋务的“实用指南”。

张之洞对文化主体性的焦虑。面对西学冲击，张之洞担忧“儒术将亡”，因此在教育改革中始终强调“存古”。他创办存古学堂，专授经史词章，并规定新式学堂须悬挂孔子像，试图通过仪式巩固文化认同。但这种努力本质是被动的文化守成，如梁启超批判：“以旧瓶装新酒，终致瓶裂酒洒。”

（二）“西学”的范畴：技术、制度与知识体系

张之洞对“西学”的接纳始终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前提，呈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他将西学拆解为“西艺”“西政”“西史”三个层次，但仅在前两者中划定有限的可接受范围。“西艺”指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涵盖算学、化学、矿冶、机械制造等领域。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汉阳铁厂、织布局、枪炮厂等洋务企业，皆以“西艺”为根基。他派遣工匠赴德国学习火炮铸造技术，甚至在湖北工艺学堂开设化学实验

课,要求学生“亲手操作蒸汽机模型,通晓其理”。这些举措看似开放,实则暗含严格限制——技术引进必须服务于“保国保教”的目标。例如,汉阳铁厂虽采用英国设备,但管理层全由科举出身的士绅把控,西方工程师的建议常因“不合中国礼法”遭拒,最终导致钢铁质量低劣,难与进口产品竞争。

“西政”的引入则更为审慎,主要指法律、教育等非政治性制度。张之洞仿照德国学制设计《癸卯学制》,将学堂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级,并引入地理、博物、体操等新学科。^[6]但他明确规定:“学堂管理人员须由科举正途出身者充任”,且课程中“修身”“读经讲经”课时占比高达30%。这种制度嫁接的割裂性,在湖北师范学堂的实践中尤为明显:学生一面学习日本教育学理论,一面被要求每日向孔子牌位行叩拜礼;物理课上讲授牛顿力学,却严禁讨论“日心说”对“天圆地方”传统宇宙观的冲击。^[7]

在知识传播层面,张之洞主导了一场选择性“西学东渐”运动。他支持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大量译介西方科技著作,仅1896年便出版《化学鉴原》《开矿要法》等实用书籍120余种,但严令禁止涉及民主思想的作品流通。传教士林乐知编译的《文学兴国策》因提及“议会选举”,被张之洞批注“此等邪说惑众,当悉数销毁”;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手稿曾送至武昌,他阅后斥之为“物竞天择乃禽兽之道,岂可施于人间伦理”。这种对西学的“去价值化”处理,导致知识体系呈现畸形状态:士子们熟稔蒸汽机原理,却不知“科学精神”为何物;律师学习《万国公法》,却仍视“民告官”为忤逆。

(三) 体用关系的辩证性

张之洞提出“可变者器,不可变者道”,试图为变革划定边界。但实践中,“器”与“道”的界限日益模糊。例如,汉阳铁厂采用西方股份制管理(器),却因官僚干预(道)导致效率低下;新式学堂引入分科教学(器),但经学课程挤压科学课时(道)。这种割裂暴露了体用二元论的脆弱性。

中体西用打破“华夷之辨”,为西学传播提供合法性。据统计,1895-1905年间,湖北新式学堂翻译西书达1200余种,推动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但是其压制制度变革。1903年《学务纲要》规定:“学生不得妄干国政,抗改学堂规条”,甚至禁止学生阅读报纸,最终激化革命思潮。

体用关系本质是“文化嫁接”的幻想。严复曾尖锐指出:“牛体安能马用?”张之洞试图以西学之“用”延续中学之“体”,却未意识到技术、制度与伦理的不可分割性。这种矛盾在1905年科举废除后彻底爆发,传统士绅阶层瓦解,中体西用理论随之破产。

四、教育实践:从理论到制度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并非纸上谈兵,而是通过系统的教育实践转化为制度性存在。从新式学堂创办到学制革新,从留学派遣到知识译介,其教育改革既体现了对传统教育体系的突破,也暴露了“体用割裂”的深层矛盾。^[8]

(一) 新式学堂的创办与课程改革

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内创办的数十所新式学堂,成为“中体西用”思想的试验场。1893年创建的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是其教育实践的典型代表。该学堂分设方言(外语)、算学、格致(物理化学)、商务四科,课程中引入《化学鉴原》《汽机发轫》等西方教材,并配备实验仪器供学生操作。但课程设置中,“中学”始终占据核心地位:每日清晨需诵读《圣谕广训》,每周安排六课时经学课程,学生作文必须以“尊孔忠君”为主题。这种“中西拼盘”模式,在1896年设立的湖北武备学堂中更为明显——德国教官教授测绘、战术,而学堂监督必须由翰林出身者担任,课堂外严禁讨论“平等”“民权”等词。

更具突破性的是对传统教学法的革新。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批判旧式书院“空谈性命,不务实事”,要求新式学堂推行“实验—实践”教学。湖北农务学堂开辟试验田,学生在德国教习指导下种植美棉、甜菜;工艺学堂设立金工车间,制作蒸汽机模型。但这种实践性教育仍受限于“中体”框架:农务学堂禁止

使用化学肥料，因其“破坏土地伦理”；工艺学堂的机械图纸需加盖“忠孝为本”印鉴方可存档。

（二）学制革新与癸卯学制的确立

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标志着“中体西用”思想的制度化。该学制将全国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级，看似仿照日本学制，实则内在逻辑截然不同。第一，经学独尊。中小学堂每周12课时中，“读经讲经”占5课时，《孝经》《礼记》为必修；大学堂专设“经学科”，与政法、文学、医科并列。第二，等级强化。学生按出身划分等级，官宦子弟入“官学堂”，平民子弟入“民学堂”，且规定“民学堂毕业生不得应科举”，刻意维持阶级壁垒。第三，管控机制。学堂设“监学”职位，由候补道台担任，负责审查师生言论；《各学堂管理通则》规定“学生不得妄干国政，私改讲义”。尽管课程西化达到了一定程度，但每月月考仍以经学为考核重点，理化实验成绩仅作“参考”。这种制度性矛盾导致毕业生陷入双重困境：既无法通过科学知识谋生，又丧失传统士绅的科举晋升通道。

（三）留学教育与翻译运动

为弥补本土西学教育不足，张之洞推动的留学与翻译构成“西学东渐”的双轨。留学教育方面，1896年首批湖北留学生30人赴日，主要进入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机械。张之洞制定《约束留学生章程》，规定“留日学生每月需向驻日领事提交思想汇报”“禁止参加政治集会”，甚至要求剪辫者“立即遣返回国”。这种管控在1902年酿成“成城学校事件”：湖北留学生因抗议校方歧视被集体开除，张之洞竟指责学生“不守本分”，转而改派留学生赴德国学习“更纯粹的技艺”。

翻译运动则呈现畸形繁荣。湖北官书局与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合作，至1905年共译西书1800余种，但内容高度过滤：科技类占72%（如《冶金录》《化学分原》），政法类仅限《国际法纲要》《普鲁士教育章程》等非敏感内容，哲学、社会学著作悉数被禁。这种选择性译介导致知识结构残缺：湖北新军军官熟读克虏伯炮术手册，却不知《战争论》中的战略思想；方言学堂学生精通英文语法，但对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性解放”主题避而不谈。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张之洞要求所有译作必须添加“按语”，如《天工开物》译本中被插入“奇技淫巧虽佳，终不若忠孝为大”的训诫。

这些实践在推动教育近代化的同时，也埋下自我否定的种子。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接触西学后，反而成为反清革命的主力（如黄兴毕业于两湖书院）；《癸卯学制》规定的经学课程，因内容枯燥遭学生抵制，1907年湖北学堂经学逃课率达63%；留日学生归国后传播立宪思想，最终动摇了“中体”根基。这种矛盾印证了严复的预言：“中学既衰，西学难附，体用两橛终将崩解。”张之洞试图通过教育嫁接维系封建伦理，却无意间为旧制度的掘墓人提供了思想武器。

五、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虽以维护封建伦理为底色，但其对文化主体性与教育改革的探索仍为当代教育提供了深刻的镜鉴。这一思想诞生于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既是对民族存亡危机的被动回应，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首次系统反思中西文明关系的主动尝试。张之洞通过《劝学篇》构建的“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框架，虽以巩固三纲五常为核心目标，却在实践中打破传统教育封闭性，推动近代科学教育体制的萌芽。

（一）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平衡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本质上是对文化主体性与开放性关系的深刻探索。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坚守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学为体），实现对外来文明的理性选择与创造性转化（西学为用）。张之

洞强调“中学治身心”，将三纲五常视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他创办存古学堂、规定新式学堂悬挂孔子像等实践，并非单纯复古，而是试图在文化危机中重塑认同。这种努力揭示了文化自信的底层逻辑——只有立足本土传统，才能避免“全盘西化”导致的文化失根。例如，湖北自强学堂虽引入西学课程，但每日诵读《孝经》《礼记》，通过仪式强化伦理认同。然而，张之洞并非僵化守旧。他对儒学的实用化改造（如编纂《书目答问》简化经典），体现了“守约”智慧——即提炼传统精髓以适应现代需求。这种“损之又损”的路径，与当代“创造性转化”理念不谋而合，如北京大学将“四书精读”纳入通识教育，既传承经典又赋予其现代诠释。

张之洞对西学的引入具有鲜明的工具理性。他将西学拆解为“西艺”（技术）、“西政”（制度）、“西史”（知识体系），但严格限定引入范围：支持翻译《化学鉴原》《万国公法》，却严禁传播民主思想；派遣留学生学习机械制造，却要求“剪辮者遣返”。^[4]这种选择性吸收的策略，既体现了对西方文明的警惕，也折射出在器物层面开放、在价值层面保守的矛盾。所以对于现在来说开放需以主体性为前提。日本“和魂洋才”的经验表明，文化融合需明确“为我所用”的边界。例如，中国在STEM教育中融入“天人合一”生态观，或在法学课程中探讨“礼法合治”的现代转化，正是对张之洞“择善而从”逻辑的超越。

张之洞的困境在于“体用割裂”。他将西方制度归为“可变之器”，却未意识到技术革新必然冲击伦理根基（如汉阳铁厂股份制管理与传统官僚体系的冲突）。这警示我们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平衡需动态调适。华为“天才少年计划”既引入西方研发体系，又强调“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实现了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的协同。并且张之洞的局限在于单向吸收，而当代更强调文明的互鉴。敦煌艺术“圣俗交融”的造境艺术，展现了中华文明吸收佛教、希腊等异质文化并重构主体性的智慧。这种“以我为主”的包容性，启示中国教育需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既输出汉语与国学，也吸纳沿线国家的哲学与艺术，构建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

（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结合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虽未明确提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现代概念，但其教育实践已蕴含二者协同的雏形。张之洞的“通经致用”思想强调儒学需服务于现实需求，如湖北农务学堂将《礼记·月令》中的农时理论与西方农业技术结合，开辟试验田种植美棉。这种“通识为体、专业为用”的逻辑，与当代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通专融合”模式不谋而合——学生先接受人文社科、自然科学通识课程，再自由选择智能工程、政治经济哲学（PPE）等交叉专业。通识教育通过跨学科知识整合（如“逻辑与理性”“文明与历史”课程模块），为专业学习提供方法论支撑；而专业教育则通过项目制学习（如华为“天才少年计划”中的技术研发与《考工记》匠作哲学结合）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张之洞虽未突破传统学科壁垒，但其对西学的分层引入（西艺、西政、西史）已隐含学科交叉意识。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因体用割裂而陷入困境，而现代教育通过通识与专业的深度融合，实现了三重超越。第一，知识结构。从“中西拼盘”转向“文化基因解码+学科范式重构”的有机整合。第二，能力培养。从单一技能训练扩展为“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全球视野”的复合目标。第三，价值导向。从维护封建伦理升华为“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共生”的现代人格塑造。这种结合不仅是教育模式的革新，更是中华文明在全球化语境下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关键路径。

（三）教育改革的渐进性

张之洞的教育改革策略以“渐变”为核心，既未全盘否定传统教育体系，又未激进移植西方模式，而是在新旧交织中寻求平衡，体现了“中体西用”思想对制度转型的深刻调适。这种渐进性不仅缓解了新旧冲突，也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其经验对当代教育改革仍具启示意义。

张之洞在改革中始终强调“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兼容性。例如，湖北自强学堂虽引入算学、格致等西学课程，但仍规定学生每日诵读《孝经》《礼记》，并将经学课时占比维持在30%以上。这种“中西拼盘”模式既保留了儒家伦理的教化功能，又通过西学课程培养实用技能，避免了文化断裂。张之洞在《劝

学篇》中提出“政艺兼学”，但明确“经学治身心”的优先性，将新学视为补充而非替代。这种双轨制既回应了“保教”的文化焦虑，又满足了“自强”的现实需求。张之洞主导的《癸卯学制》（1904年）是中国近代首个系统学制，其设计充分体现渐进特征。第一，经学科独立设置。在初等、中等学堂保留读经讲经课程，大学堂专设经学科，与西方学科并列，既维护儒学正统地位，又为经学向现代学科转型预留空间。第二，科举与学堂的衔接。规定学堂毕业生可获举人、进士出身，缓解旧式士人对新学的抵触。张之洞称此举“使新旧两途相资为用，不使偏废”，实则为科举废除铺平道路。第三，层级递进的课程体系。小学堂以识字明理为主，中学堂引入西政基础，大学堂侧重专业分科，形成由浅入深的渐进路径。

张之洞意识到，教育转型的关键在于师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旧学师资改造，选拔科举出身的儒生进入师范学堂接受西学培训，要求“通经史者兼习格致，明算学者旁涉舆图”，促使传统士人向现代教师转型；其次是新式师资引进，延聘日本教习教授西政、西艺，但规定外籍教师须受中国监督，确保教学内容不偏离“中体”框架；最后是本土化教材编纂：主持编订《书目答问》《群经要义》等教材，将传统经学简化为通识课程，既降低学习难度，又避免西学过度冲击。并且张之洞的改革是先进行局部试验，成熟后再逐步推广。

张之洞的实践揭示，教育改革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缓冲带。首先可以建立起对文化连续性的维护，如当前九年义务教育改革强调“经典诵读”与“创新素养”并重，既传承文化基因，又培养现代能力。其次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借鉴张之洞“守约”理念，可将标准化考试与综合素质评价结合，避免“唯分数论”对教育生态的破坏。最后建立缓冲带可以对区域试点进行风险控制：上海“双新”实践通过局部试验验证课程改革可行性，再逐步推广，与张之洞的“湖北模式”异曲同工。张之洞的渐进性策略虽因时代局限未能彻底解决体用矛盾，但其“在保守中求变，在变革中守本”的智慧，为当代教育转型提供了历史镜鉴。正如他在《劝学篇》所言：“变器不变道，变事不变法”，这一思想提醒我们：教育改革既需突破陈规，亦需守护文明根脉，方能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海鹏,雷颐.冲破闭关锁国困境开眼看世界的中国[J].云南教育(视界时政版),2013,(04):32-35.
- [2] 赵德馨.张之洞全集:第三册[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
- [3] 王玉彬.张之洞与儒学的近代转型——以《劝学篇》为中心[J].孔子研究,2024,(06):100-108+159.
- [4] 张之洞.劝学篇[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46.
- [5] 《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全集卷 202, 19-21.
- [6] 王荷池.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研究(1840-1949)[D].东南大学,2018.
- [7] 赵婧怡.张之洞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2016.
- [8] 张传燧,袁浪华.张之洞近代学科知识体系构建思想及其影响[J].大学教育科学,2018,(04):91-97+127.

A Concise Analysis of Zhang Zhidong'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Essence, Western Learning for Practical Use "

Yan Pan¹

¹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210000, Jiangsu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external pressure and internal unrest, Zhang Zhidong proposed the theory of "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essence, Western learning for practical use " and the corresponding educational practice, exploring the internal tension between cultural conservatism and modernization demands. Through his "Encouragement of Learning", Zhang Zhidong constructed a framework of "Chinese essence and Western application", with the core goal of maintaining Confucian ethics, and decomposed Western learning into three levels: "Western arts", "Western politics", and "Western history". He attempted to absorb Western technology, systems, and knowledge systems to a limited extent while consolidating the feudal ruling order. This ideology was manifested in the "Chinese-Western patchwork" model in educational practices such as the Hubei Self-Strengthening School, the Ancient Learning School, and the "Gimao School System". Although Zhang Zhidong's gradual educational reform failed to save the feudal system, it provided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first, cultural confidence needs to be premi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and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 should be refined through the "holding to the essentials" strategy; second, the collaborative logic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ranscends the "essence and application dualism", inspiring contemporary education to achieve the symbiosis of humanistic spirit and scientific rationality; third, educational reform needs to establish a buffer zon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chieving dynamic balance through local experiments, teacher transformation, and diversified evaluation.

Keywords: Zhang Zhidong;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Essence, Western Learning for Practical Use; Educational Thought; Modern Revelation